

汉语基本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 能 甫

内容摘要 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深受斯大林语言学说的影响,由于斯大林语言理论的言简意赅,因此引起了中国学者对“基本词汇”和“基本字汇”有无区别、虚词应不应该归入基本词汇、怎样看待基本词汇的特点等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在争论中解决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对今后的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主要应扩大范围,对其作历史层次的考察,特别要重点研究先秦两汉时的基本词汇。

关键词 汉语 基本词汇 基本词 稳固性 能产性 全民性

1.0 界说

基本词汇是指一种语言中,该民族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经常要使用的那部分词语。全民常用性是一切基本词汇的共同特点。研究汉语的基本词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说明汉语的特点和它发展的规律性”^[1],“有助于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汉语词汇”^[2]。

2.0 解放前的研究

对于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1947年,孙伏园写了《基本词汇研究述要》^[3]一文,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早使用“基本词汇”这一术语的论文。文中对基本词汇这一用语进行了界说和举例,把日常生活和常用性作为基本词汇的主要特点。孙伏园认为,基本词汇是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懂的词,受过教育的人能听、能说、能读、能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虽然能听、能说,但是不能读、不能写。这篇文章已经初步涉及到了基本词汇的本质特点,即全民性的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发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国外语言理论的引进,中国人已经对基本词汇进行了不自觉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很幼稚,但确实涉及到了基本词汇的重要特点,说明基本词汇在语言的词汇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3.0 斯大林语言学说发表后的研究

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系统论述了基本词汇的情况,他说:“语言词汇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基本词汇,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词成为基本词汇的核心。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狭窄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历史时期生存着,以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斯大林的“基本词汇”和孙伏园的“基本词汇”不完全相同,因为斯大林的这一术语是翻译过来的,但是它们都共同涉及到了全民常用性这一主要特点。由于斯大林的论述很是简明扼要,有些地方他又没有提到,因此,这个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在结

合中国语言研究的具体实际时,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基本词汇”和“基本字汇”有没有区别

在中国的语言学者中,最早应用斯大林的基本词汇学说来谈汉语中的基本词汇问题的是李荣。1952年,他在《科学通报》三卷七期上,发表了《汉语的基本词汇》一文。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想解决汉字识字教育上的实际问题,因此,可以被看成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汉语的基本字汇和基本词汇问题讨论的延续。在文中,他把斯大林关于基本词汇的论述概括为三个特点,同时也认为,斯大林理论虽然适合于所有的语言,但是,举例是俄语的,应该结合汉语的特点进行研究。汉语的特点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单音字词为主体,任何一个方言区的人谈话,都是以单音字为主的。因此,结合汉语的实际,他把基本词汇称为基本字汇。他的这一提法,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如李向真先生。他在《关于汉语的基本词汇》(见《中国语文》1953年4月号)一文中认为,要准确无误地去领会斯大林的学说,不要随便曲解,斯大林的“基本词汇”是不能任意地改为“基本字汇”的。对于他们的争论,曹伯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4],结束了这场争论。曹伯韩认为,俄语中的字和词虽然没有区别,但是汉语中的字和词区别是很严格的。李荣先生由于没有分清汉语中字和词的界线,所以就随意地改译基本词汇为基本字汇。这场争论得到的结论是:汉语中字和词是有区别的,基本词汇是不能改译为基本字汇的。

3.2 虚词应不应该归入基本词汇

从词类的角度看,对于基本词汇包括哪些词类这个问题,斯大林的语言理论本身没有明确谈到,中国学者在研究汉语的实际中必然会有争论。林焘先生认为,斯大林的理论中包含有“研究基本词汇的最重要的材料”^[5]，“问题只在于对斯大林这些天才的指示如何正确的理解和发挥”^[6]。如何去“理解”和“发挥”，不能凭想象，应该结合斯大林文章发表时的苏联语言学界的状况去分析。斯大林本人不是职业的语言学家，他的这篇关于语言学说的文章，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他的研究心得。他借鉴参考了当时苏联的语言学著作，在此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可以说，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联语言学的研究水平。因此，结合当时苏联语言学界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基本词汇的范围是很大的，各种词类都有，虚词也不例外。事实上，当时苏联的很多语言学家都承认虚词是基本词汇的一部分。Л. Я. 车尔内赫说：“除了表示现实概念原始的名称外，一些表示语法范畴的词，所有共同斯拉夫语的代词——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所有共同斯拉夫语和东斯拉夫语的数词，所有的虚词（前置词、连词、小品词）也都属于基本词汇之内。”^[7] А. Д. 格里戈莉耶娃认为，“代词、数词、前置词、连词是属于基本词汇的”^[8]。В. Н. 安德烈耶娃指出：“表示最广泛抽象概念的词，以及代词和虚词也属于基本词汇。”^[9]林焘先生在发挥斯大林语言学说时，把虚词排除在基本词汇之外，这不符合事实。因此，针对林焘先生的观点，赵振铎先生写了《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吗》一文，以令人信服的理论解说、翔实的例证广泛地引证当时苏联语言学界的看法，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早在1947年，孙伏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在“基本词汇甲部”^[10]即“日常生活词汇”中，从词类的角度对基本词汇进行了分类，计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因此，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从基本词汇特点的角度考虑，虚词应该被包括在基本词汇之内。

3.3 怎样看待基本词汇的特点

基本词汇到底有哪些特点,斯大林并没有明确提出来,国内在引进斯大林的理论后,根据斯大林的论述以及苏联语言学界的讨论,概括归纳为全民性、稳固性、能产性三个特点。从此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界深受其影响,在讨论基本词汇的时候,都以这三个特征作为标志。表面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但是,仔细一推敲,问题还很多。

比如:基本词汇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是全民性呢还是构词能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有的人认为,“一般说来,全民性这个特征则是一切基本词汇的词所共有的”^[11]。也有的人认为是构词能力,“这是基本词汇最主要的属性”^[12]，“词的有无构词能力是判断一个词是否基本的先决条件”^[13]。对于这两种看法,我们倾向于前者。如果按照构词能力的标准,那么就只好把基本词汇中的代词、副词、连词、助词等没有什么构词能力的词排除在基本词汇外,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又比如: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特点才算基本词汇呢,还是只要具备其中的一两个就可以?没有构词能力或者构词能力弱的词算不算基本词?对于这些问题,前辈学者已经给我们作了解答。潘允中先生认为,“基本词汇……具有的特征是:历史稳固性,全民性,有构词能力。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基本词汇都同时具备这些特征,有的只具有其中的两个,例如亲属名称多半是这样”^[14]。潘先生的意思是说,亲属名称的词属于基本词汇,它们大多数只具备“全民性”和“历史稳固性”这两个特点,没有什么构词能力。因此,构词能力在基本词汇中并不是最主要的属性。基本词汇中,除了亲属称谓的词构词能力弱之外,虚词也没有多少构词能力,像现代汉语中的“因此”、“被”、“才”、“就”、“也”、“再”、“很”、“最”、“从”、“比”、“同”、“朝”、“按照”、“为着”、“对于”、“关于”^[15]等虚词,它们是被公认的基本词。如果过分强调基本词汇的“构词能力”这一特点,它们就会被排除在基本词汇之外;如果一点也不考虑“构词能力”这一特点,那又为什么要把能产性作为基本词汇的三大特征之一呢?对于这个问题,赵振铎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解答了我们的疑难。赵先生认为,“能不能归入基本词汇,要看它是否具备基本词汇的条件,如果条件具备了而不把它列进去,那是不公正的”^[16]。“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些词只符合两个标准而不符合另一个标准,不考虑它的原因就把它排斥到基本词汇之外去”^[17]。因为“基本词汇的标准不应当理解成一个签条,而应当理解成表示它们历史发展特殊趋势的词的一定范畴的特性”^[18]。赵先生的这些见解对于帮助我们判断基本词汇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再如稳定性的问题:人们都爱说基本词汇具有历史的稳固性,究竟多长时间才算稳定,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以现代汉语而论,有的基本词的历史很悠久,有的却很短。像“天”、“地”、“年”、“月”、“东”、“南”、“手”、“心”、“父”、“母”、“牛”、“羊”、“家”、“布”、“车”^[19]等基本词,从上古时代至今,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三千余年的历史,这无疑是很稳定的。也有一些词,如“皆”、“罍”、“祭”、“祀”、“鼎”、“趋”、“诚”^[20]等,它们是两汉时代的基本词,用在《尔雅》、《说文》中,作为训释词来解释前代的词语。它们上距甲、金文时代一千余年,在现代汉语里已经完全不用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算不算稳定?还有一些词,如“飞机”、“共产党”、“工厂”等词,在汉语中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基本词汇的词^[21]。这几个词在汉语中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它们仍然是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基本词有几十年历史的,

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也有三千多年历史的。稳定性这一特点到底以多长时间为界,还需要认真考虑。

总之,由于斯大林理论本身的简明扼要,使得我们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有些问题达成了共识,如虚词归入基本词汇的问题;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无可否认,斯大林的语言学说,对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确实具有指路的作用。

4.0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对汉语的基本词汇进行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关于什么是基本词汇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它勾勒出一个明确的范围”^[22]。正因为如此,给它勾勒出一个范围是势在必行的。我们认为,今后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研究。

4.1 扩大研究的范围

基本词汇的词在数量上,不是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能够包括得了的,应该有几千个。现在,一般人在谈到基本词的时候,都几乎是千篇一律地举出几十个、上百个基本词作为例证,这样的研究,范围太狭小,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古汉语为例,日本人藤堂明保举了677个基本词汇^[23],殷孟伦先生以为先秦两汉“基本词汇约六百余”^[24]。这两个六百多远非古代汉语基本词的全貌。又以现代汉语为例,日本学者在研究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的时候,在范围的划定上也不一致。仓石武四郎认为有1000个^[25],《中国语学事典》一书收了1500个^[26]。无论是1000还是1500个,我们认为都还远远不够。我们认为基本词汇的词应该有几千个,只有像这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才有意义。因为学习语言必须抓住最本质的基本词部分,只有掌握了基本词,才能够完成交际的任务,其它的问题也才可能迎刃而解;如果连生活所必需的词都没有掌握,那将会寸步难行,其它的问题更无从说起。我们倾向于在孙伏园的基本词汇甲部即日常生活词汇四千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增删,以此范围来作为研究基本词汇的出发点,应该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这样既能解决实际问题,也具有理论价值。

4.2 对基本词汇作历史层次的研究考察

在谈及基本词汇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时候,一般也承认它在缓慢地变化。至于缓慢到哪种程度,没有人进行过调查研究,都只能很模糊地说。根据西方语言年代学专家的研究,“各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每经过一千年,大致只能保持81%不变”^[27]。据此,我们认为,对汉语的基本词汇作历史层次的考察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不同历史时段的基本词是不太一致的,先秦两汉汉语的基本词和现代汉语的基本词肯定不完全一样。哪些词语是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哪些又是新增加到基本词汇的行列中去的,没有断代的研究,谁也说不清楚。比如前面举过的基本词汇“天”、“年”、“手”、“牛”、“羊”、“车”、“飞机”、“共产党”、“工厂”,它们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基本词,但是它们的历史长短很不一致,有些是三千多年前就有的,有的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如果对它们没有历史的考察,就弄清基本词汇的继承与创新,对于科学的研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根据汉语史的分期,可以把基本词汇划分为三大段:上古汉语基本词汇、中古汉语基本词汇、近代汉语基本词汇。对各段的基本词汇,选择一些该段有代表性的语料进行深入地研究,只有进行了这一步工作,才会对汉语的基本词汇的继承与发展、消失与新增、历史稳定性的长短等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样的研究对于汉语史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要研究先秦两汉的基本词汇,可以选择这

个时期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专书进行研究。首先选取《尚书》、西周金文、《周易》、《诗经》的“雅”、“颂”部分中的共同用语,作为上古第一期基本词的语料进行研究;然后再选《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中的共同用语,作为上古第二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基本词语料进行研究;最后选择《史记》、《论衡》、两汉注释语料中的共同用语,作为上古末期即两汉时期的基本词语料进行研究。综合三期的研究,求同去异,先秦两汉基本词汇的大致轮廓也就清楚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基本词的研究依次类推。再综合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的基本词研究的成果,汉语基本词汇的发展史也就比较清楚了。因此,加强对汉语基本词汇历史层次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4.3 重点研究先秦两汉基本词

词汇研究,要真正做到正本清源,必须很好地研究始见书、始见时代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其来龙去脉有整体的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基本上肇始于先秦两汉,因此,加强对先秦两汉语言特别是词汇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进一步阐释和解读中国文化是很有帮助的。殷孟伦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这一段,是汉语形成和发展的源头。基本词不过数百,一般词统计起来,也不超过七、八千,复音词的比例也小,除人名、地名外,不管有关天文律历、政治道德、学术教育、经济法制、宗教祭祀、军事音乐、风俗礼仪、器用服食以及传说、俚谚、成语等等,都在其中。”^[28]由此可见先秦两汉这一段在中国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从基本词汇的角度看,可以说,汉语的基本词汇,在先秦两汉已经初具规模了。因为,“语言越原始,基本词汇在词汇里所占的比重越大,语言越发展,基本词汇在词汇里所占的比重越小”^[29]。因此,研究先秦两汉的基本词汇,实际上就是在研究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意义重大。研究的方法,除了上面提到的选取这一时期的若干专书进行研究外,还可以从注释语料和字典辞书的角度去研究。这种研究,很能结合古代汉语的实际,而且还可以完善斯大林的基本词汇学说。如注释语料,它是用当时人所熟悉的词语去解释说明前代典籍中的用语。注释语言基本上都是全民用语,其中包含了相当多的基本词。从汉代的注释语言入手,可以看出先秦两汉基本词汇的部分面貌。如《诗经·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郑玄笺:“居,坟墓也。”《诗经》中的这个“居”,在东汉称为“坟墓”。“坟墓”一词应该是郑玄时代的人都熟悉的词语,是一个基本词。这个基本词不是东汉时代新兴的,它是继承前代来的。《周礼·地官·司徒》、《墨子·七患》中都有“坟墓”一词。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中仍然有它。可见,对注释语言中的基本词进行研究,可以初步地弄清楚基本词汇稳定性的情况。又如《尔雅》、《方言》、《说文》、《释名》这些两汉时代出现的字典辞书,它们的解释词大多是全民用语,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的基本词。通过对辞书中解释词里的基本词进行研究,也可以部分地了解先秦两汉基本词的情况。总之,从汉代注释语料和汉代字典辞书中的解释词和串讲词语入手来研究基本词,是基本上能够弄清楚先秦两汉基本词的部分概貌的。

注释

[1][2][7][8][9][15][16][17][18] 赵振铎《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吗》,《人文杂志》1959年3期。

[3][10] 孙伏园《基本词汇研究述要》,《四川教育通讯》(28)1947年。

[4] 伯韩《李荣李向真两位先生关于基本词汇的论文读后感》,《中国语文》1953年7月号。

[5][6] 林焘《汉语基本词汇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7月号。

- [11][21]见上外、哈外编《语言学引论》，时代出版社1958年版。
- [12][13]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14]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19][22][27]见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 [20]张世禄《从训诂学上来看古汉语的基本词》，见《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 [23](日)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江南书院刊行，1957年。
- [24][28]殷孟伦《谈谈汉语词汇研究的断代问题》，《文史哲》1981年2期。
- [25][26]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 [29]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张能甫: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史博士生,四川成都610064)

·书讯·

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出版

由四川师大李成良教授撰著的《阮元思想研究》一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著者所承担的四川省教育委员会1997年重点科研课题。全书分为9章,加上附录一《阮元学术交游考略》、附录二《阮元生平纪要》(即年谱简编),约30万字。

阮元作为乾嘉学术的最后重镇,继承了清初学风的传统,兼容吴派、皖派,发扬了乾嘉学术的严谨、科学学风,并调合汉、宋,在历史上起到了总结作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说过:“阮公任道多,积德厚,履位高,成名众。”“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并将其学问分为“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十大类。由于阮元的学术范围恢宏,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甚至教育、金石、天算、书法、科技史等等,都有相当的研究,故被称为“无学不通”。可以说,对阮元的研究涉及到许多的专门领域,而对其每一个领域作深入研究都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著者多年来致力于阮元研究。该书根据所掌握大量的的历史文献,从阮元生活的时代开始,进而剖析其政治思想、经学思想、教育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金石学及书学思想、文献学成就及研究、科技思想等等,对阮元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在很多方面提出了开创性的见解,是中外学术界对阮元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还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爬梳、考辨,写出《阮元生平纪要》(即阮元年谱简编)。又列举了67位学者与阮元交游的有关事略,写成了《阮元学术交游考略》,作为“附录”列于书后,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阮元,还可以从一个大的横断面了解乾嘉学术的梗概。《光明日报》1998年5月14日载文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称赞该书多有开创性见解,并指出:“《阮元思想研究》作为第一部阮元研究专著,对于进一步认识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对于深入研究19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的面貌,都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晓文)